

中美创业比较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Yanbo Wang (王砚波) Danyang Chen (陈丹阳)

摘 要：Wu 等 (2020) 为中美创新创业 (比较) 研究提供了一个回顾、反思、融合与拓展的切入点。他们就创业中两个核心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市场与技术快速演化的不确定性以及来源于制度快速演化的不确定性——系统地总结了过去 20 年基于中国或美国场景的重要文献并就双方如何借鉴彼此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提出了具体而有创意的操作建议。本文在该基础上就中美创新创业比较研究的学术目标以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陷阱做出进一步的阐述。我们认为跨场景的比较研究是验证理论框架解释力边界的最佳方式之一。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更好地研究与诠释本国的实践与经验，以期在讲述有中国特色的独到故事的同时推进跨时间、跨制度、跨地缘的普适性理论机制构建。在实践中，学者要明晰基于一方实践而构建的理论的隐藏性的假设与边界条件。只有明晰这些假设与边界条件，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哪些理论机制与预测在跨境“移植”上有很强的相关性以及跨境解释空间拓展的潜力。

关键词：创业；不确定性；比较研究；技术曲线；制度演化

Wu 等 (2020) 的《动态环境中的创业活动：中美对比》是一篇重要而及时的文章。不仅对 21 世纪前 20 年中美创业研究的关键理论脉络和文章做了深入的总结，而且提出了很多值得中美学者思考与讨论的课题。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随着中国积极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随着双方在经济文化上合作的不断深入，中美间的互动对于彼此以及全球的经济与社会福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无论是在政策制定层面，还是企业实践领域，并没有足够让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有质的加深，或者说双方对彼此误解的空间有根本性的消除。Wu 等 (2020) 无疑给管理学者就中美创新创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回顾、反思、融合与拓展的切入点。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基于中国背景的管理学研究呈现几何级的增长。这里不仅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现象深入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本土学者在世界顶级期刊讲述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当然也有很多文章或是落入拷贝延展的模式——沿用经典的、“主流”的、基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构建的理论范式来套读中国的实践，或是落入过分解读本土特色而忽视潜在的跨时间、跨制度、跨地缘的普适性理论机制的挖掘。如何寻求一种既能讲述有中国文化制度特色的独到故事又能够推进更为底层的、具有更广泛借鉴意义的理论构建可能是越来越多学者追求的黄金标准。

很多学者与机构都为结合中国本土环境来推进普适化理论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努力，*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于 2015 年推出了一期论坛来探索如何融合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制度安排和思维方式来推进管理学研究 (Berkema et al., 2015);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于 2017 年就关于这个蕴含深刻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与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分析架构推出了一个多视角的对话 (Burt & Burzynska, 2017; Lin, 2017; Bian, 2017; Sorenson, 2017)。除了这些特刊，很多学者的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好的研究样板。比如黄亚生先生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低端劳动密集型外资在中国的扩散的思考 (Huang, 2003)，岳庆媛教授与合作者就舆论监督、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因素对中国各地寺庙市场化的影响的考察 (Yue et al., 2018)，王丹青、罗小微教授就官员职业生涯阶段与其辖下国企的跨行业并购行为的关联的研究 (Wang & Luo, 2019)。细心的读者会发

现很多优秀的文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作为全球创业的两个巨擘，中美任何一方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实践探索，而双方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可能给我们提供空间来思考有趣且重要的话题。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制度安排、发展阶段以及语言体系，中美之间在商业模式、企业战略以及组织架构的表象和逻辑上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中美竞合关系升级与恶化并行的今天，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并且建立双方都能理解与接受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助于减少相互间的误解，亦会加深理解对方经验教训背后的机制，从而创造从彼此的差异与多样性中学习的机会。从学术角度讲，中美对比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与数据之间对话的机会——当一方学者根据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所提出“优雅理论”与大洋对岸的“丑陋数据”在对话中出现不匹配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理论背后存在着基于制度、文化或者科技的隐性假设。这些隐性假设是我们认知上的重大盲点。本来思想的进步是一个理论与数据对话，发现异端的观察点，调整理论框架以拓展其解释力边界的周而复始的过程，但遗憾的是因为圈子、评估体系、语言和话语权等方面的因素，这些不匹配往往被忽略而不是被深入地挖掘。从这个角度来讲，Wu 等 (2020) 对于中美创业研究的总结、对比与思考无疑是值得想要透过现象看机理的学者认真研读的。

创业者往往要通过技术、商业模式或者生态的创新与重建创造新的价值。这个过程中不仅技术探索和市场演化充满了不确定性，企业家拥抱风险中的很多创新行为往往挑战既有的思维方式、利益结构以及监管条例而导致他们

的“合法性”受人怀疑。Wu等(2020)就创业公司如何应对市场变化和制度变化两个核心课题对相关文献做了扼要的总结分析,对中美两国创业研究如何基于这两个核心课题相互借鉴提出系统性的论述,尤其重要的是她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就跨越场景差异进行“移植”、整合与拓展的新视角。相信认真研读的学者会很受启发,发现了解外部世界的努力是一个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度的独特路径。

在下面部分,我们将首先对Wu等(2020)的主体内容进行概述,然后与读者分享自己就中美跨境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陷阱与挑战的一些理解。因为Wu等(2020)是一篇综述性很强的文章,我们对其的总结难免会以偏概全。就中美创业跨境研究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认为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它们来源于同一系列的要素。中美之间,因为企业关注的技术发展阶段整体不同,支持市场运作的制度存在的缺陷的程度与维度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有很大差异,导致双方无论在静态的横切面运营环境比较还是纵切面的动态环境演化上都给学者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来说,环境的最小相似性恰恰提供了理论边界的测试;从相互借鉴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环境差异也容易让理论的跨境陷入“南橘北枳”的尴尬。我们会在第三部分探讨这些差异对中美创业对比研究构成的潜在陷阱与约束。

一、WEE (2020) 内容概述

Wu等(2020)的综述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作者在第一部分通过文献总结指出:美国早期科技企业往往要面临很高的技术与市场演化的不确定性,如何在保持应对难以预料情况的灵活性的同时有效地把握和挖掘机会是创业者要面对的两难问题。他们提炼了聚焦于三个层面的模型——微观(管理者个人认知)、组织内部(管理团队)和组织间(组织合作等)——来分析诸多因素如何影响创业者努力平衡动荡环境中的战略灵活性和有效性的决策过程。首先,从个体认知角度,作者总结创业者不必一蹴而就,而是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阶段来选择性平衡灵活性与有效性。比如刚成立的公司可以侧重于有效性决策,并在不断成长中调整组织结构和战略以达成灵活性。与此同时,创业者需要结合多维度来分析环境选择偏向于灵活性还是有效性。管理者可以开发自己的抽象思维和多角度思维方式找到解决之道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其次,作为创业核心的创业团队,其组织结构和人员交互同样决定着战略应对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作者总结发现团队成员背景和经历的相关性有助于提高决策有效性;而多样化的背景经历则会增强决策的灵活性。此外,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高效互动也会帮助实现这两者的平衡。最后,作者指出组织间的合作有利于及时获取信息、资源和机会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因此,通过主动地建立组织间联系和作为第三方搭建起桥梁将获得这些资源,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另外,创业公司也应同时关注单一关系可能导致的决策僵化。作者指出拓宽组织联系,有次序地关注管理组织关系和轮换组织领导能够减少对这种固定关系的依赖,从而增强决策

的灵活性。

在第二部分，作者回顾了基于中国背景的创业研究，指出制度的变化是导致中国创业环境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变化从上而下遍布各个角落。新兴的经济环境、政策条例、社会规则以及文化现象挑战着旧有的制度、思维和行动方式。这些碰撞为中国的创业活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作者总结这些制度变化对中国创业企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制度门槛的降低、制度中介的出现以及制度间的不一致性（institutional inconsistency）。学者们对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多的，这里我们主要看第三方面。

在中国，由于现有制度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制度改革在各地、各层级、各功能部门的推进的步伐并非一致。这最终导致创业者在身处演化进度不统一、监管要求不一致的制度环境中进退维艰。Wu 等（2020）尤其探讨了“985”计划。虽然这项政策的本意为推进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创业，但因为它与同时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匹配，最后在成效上反倒有些事与愿违。我们也认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提供了研究制度不一致性对企业行为、组织架构和绩效影响的沃土。钱颖一先生很早就提出“中国式联邦主义”的概念来解释各地区之间经济改革和制度进程的差异（Moninola et al., 1995）。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新旧政策制度的共存、冲突与交替，这是矛盾与互补的多种力量共生演化的过程（Luo & Chung, 2005; Yue et al., 2019）。在制度不一致的运营背景下，Chuck Eesley 教授提出创业企业需要发展出多元的企业战略以兼顾各个方面的

制度要求，从而避免因外部冲突带来的企业自身的战略冲突。在重多的逻辑、规范与利益上的冲突与潜在互补并存的情况下，创业公司如何调整自己的团队构成、组织架构以及设计和执行战略无疑会为我们加深对很多理论视角的理解提供独到的机会。

在第三部分，Wu 等（2020）提出中美两国的创业研究应互相借鉴学习，以期突破单一情境研究的约束，在重新审视现有理论框架的边界的过程中对它们再认识与修订以提升其潜在普适性。一方面，随着中国初创企业技术含量的增加，中国企业家将面对竞争越发激烈的市场和快速更新换代的技术。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不应再过分注重制度因素而忽略来自市场与技术方面的力量。作者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将中国本土特色与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三层分析模型相结合，探讨创业者、高管团队以及组织间是如何制定与执行战略并经营战略的灵活性与高效性之间的关系。在具体操作上，这些可能体现在创业者将平衡法引入领导决策过程、借鉴美国创业团队的架构与机制以及积极探索如何减少对单一政治关系的依赖来构建多元的组织关系网络等。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中国创业者应对制度变化的经验非常值得美国的企业家和学者借鉴。这种学习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未雨绸缪地准备应对可能的制度变化，同时也能为他们在海外投资与合作提供经验与支持。综上，作者在对比分析两个看似平行的研究群体之后，提出中国和美国的创业研究应该进行交叉学习并就如何相互借鉴与促进提供了很多独到而具体的建议。

二、中美比较研究中的潜在陷阱

中美间在制度、文化与社会上的多重差异为我们做比较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同时也在相互借鉴与学习上设置了很多障碍甚至陷阱。如何在深掘本土故事与构建普适化理论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北美以外）创业学研究的一个普遍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植根本土以期了解中国市场、企业和个人的“特色”实践，亦需突破“南橘北枳”的表象差异以求共通底层逻辑与机制。Wu等（2020）就潜在的共通领域提出了很多方向性的建议，我们在这里更多的是探讨通向彼岸航途中的潜流与漩涡，分析基于一方实践来构建的理论所常见的隐藏性的边界条件。只有明晰这些边界条件，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哪些理论机制与预测在跨境“移植”上有很强的相关性以及理论解释空间拓展的潜力。对应Wu等（2020），我们的注意力将聚焦在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

（1）技术与技术演化。过去25年时间里，中国涌现了大量的科技型企业。在有些领域，中国企业已经走到国际前沿。然而整体上来说，中美学者所关注的创业型企业所面临的技术环境和产业阶段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各种原因，研究美国创业的学者往往关注处在技术演化S曲线左下方的科技型企业。因为技术演化阶段的原因，这些企业的核心任务是探索潜在的技术路径以期自己的产品能够成为“主导设计”（Utterback, 1994; Utterback & Suárez, 1995）。在这种情况下，创业团队的首要战略挑战往往是如何在各种已知甚至未知的技术路径中进行

具有一定程度赌博色彩的选择。信息的多样性（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组织层面的认知盲角）、组织架构的扁平性（以便最大化团队内部信息的流动与整合）、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以便在组织层面最大化地对不同路径进行探索）以及资源配置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度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某一时间段剧减，而企业的战略方向也相应地从灵活性的探索向有效力的执行做出调整（Li & Atuahene-Gima, 2001; Greenberg, 2019）。从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团队构成、组织架构以及战略选择能够帮助企业很好地扫描运营场景、判断市场与技术演化方向、阶段与速度以实现战略灵活度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与转变吸引了大量美国创业研究者的注意力。

相对而言，研究中国创业的学者——尤其是侧重量化分析的学者——关注的企业更多是在技术S曲线中上偏右甚至右上侧。这些企业虽然也面临技术与市场演化的不确定性，但技术路径整体明了，市场需求已被验证。相对于S曲线左下端企业需要在技术方向、资源配备和战略选择上保持灵活度，“主导设计”确立后出现的创业型公司面临更多的是资源动员与战略执行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员背景以及信息的多样性、管理和决策过程强调广泛参与咨询的团队文化以及不可避免让执行效率受到制约的战略灵活度都可能是很多公司不愿接受的。当然，活跃在技术曲线中右端的企业也不仅强调执行效力，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同时认真从事创新的实践。我们在研究这部分企业的时候，很可能需要就两种紧密相关但本质不同的

创新努力做出区分：①沿着既有的曲线进行能力提升与技术追赶的创新努力；②从既有曲线向新的曲线跳跃的创新探索。第一种努力的实践者虽然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努力的方向是相对明晰的，潜在的知识源也是可以追溯的。对于这些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的吸收能力、对接外部知识、调整贸—工—技之间的战略关系，Linsu Kim（1997）关于从模仿到创新的研究可能比 James Utterback（1994）关于从产品创新到流程创新的研究给相关学者带来更多的启发。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第二种努力的企业面临与北美常被关注的科技创业企业相似的技术周期与市场环境，这让中美双方研究者进行直接的对话与相互学习变得相对简单明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双方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潜在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可以让比较性研究，即使是间接的比较性研究，变得既刁钻又富有挑战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2）制度与制度变迁。Wu 等（2020）就中美创业者所面临的不同制度环境以及制度环境演化对创业与创新的影响机制做了非常全面的总结。我们在这里仅做一点补充：在比较研究中，除了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力度，我们也需要关注中美两国制度的现存状态或发展阶段。在这里，我们对制度的界定比较宽泛，既包括政治制度和政策举措，也包括支持市场顺利运行的中间机构（market intermediaries）。这里我们可以用舞台与戏剧做一个比喻。在支持性制度举措发达的区域与国度，创业的舞台已经被前人搭建起来，创业者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与市场和技术相关的戏剧设计和表演好。相反，在这些制度举措缺失或者杂乱无章的环境里，

创业者不得不将自己化身为多面手，既要在缺工减料的情况下搭台又要在面临被砸场的风险下唱戏。舞台本身的大小、平坦度和扎实无疑会对剧本的内容、执行和谢幕方式产生影响，而在一种制度环境下糟糕的战略和组织方式在另外一种制度环境下可能是非常优化的（Khanna & Palepu, 2000）。这也难怪在转型国家最为显学的社会科学是政治经济学。

制度的初始状态亦会间接地影响企业的战略、组织架构和业绩表现。制度的演化不仅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而且在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意识形态对创业者不友好以及各级官员寻租行为泛滥的情况下，新的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很有可能与旧的制度逻辑和内容相互冲突，最后被执行的政策与初始设计的政策之间有所脱位。制度的初始状态与改革者想要达到的目标状态之间的距离越大，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政策以及制度不一贯性就会越强。就这一点，我们可以将 Wu 等（2020）关于制度不一致性的视角和 Eisenhardt 教授关于动态环境的四个层面相结合。在本来就高度复杂（complexity）、模糊（ambiguity）和不可预测（unpredictability）的制度的场景下试图快速（velocity）推出一系列的政策来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努力很有可能导致政治系统内部的矛盾甚至割裂。

相对在自由市场体制下运营的创业者来说，在一种对市场机制试图主动拥抱但却常常怀疑的体制下运营的创业者无疑在决策的逻辑、优先点以及时间的预期上会有不同。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可能不仅要兼顾战略的效率与灵活性，同时也要在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之间、在粉饰性举措和实质性战略行动间寻求平衡（Chung &

Luo, 2008; Jia et al., 2013)。除横向比较上我们需要明确地界定不同国家在制度逻辑与运营机制方面的区别与共通外,在纵向演化研究的实操上我们也要明晰理论构建上的假设(Chen et al., 2015)。转型国家往往有很多新的政策实验,很多政策间、机构间的张力与冲突,很多的灰色的实践空间。这些都给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多的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的机会。虽然发达社会的很多制度设置和政策创新会给我们对标与启发,但研究者一旦忽略新旧政策之间的镶嵌性以及“最佳实践”与制度环境逻辑一致性的要求,理论构建有可能会落入线性思维的陷阱来强行建立起始点移向对标点的模型。即使在乐观的螺旋形上升的制度演化模型里,这种方向性的移动虽然存在,但可能不是我们能够发现的在实证上最有解释力的、在理论上最有创新的机制。

三、结论

正如 Wu 等(2020)所言,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发现惊喜、冲突甚至更深的思考。只有通过对比,我们才能真正地探索到自己理论框架的边界,才能了解他山之石可否攻玉,才能了解“南橘北枳”的表象差异下是否被掩盖着更为普适性的演化机制。相互借鉴的思维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潜在的提升企业架构、战略和最终业绩的方案。很多管理学的研究关注的是发生了什么以及关联现象背后的潜在机制。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企业战略和组织架构可能只是众多潜在选项之一,它们虽然是被广泛接受的“平衡点”,但存在并不代表最佳。正如

跨领域的观察与结合往往是创新的源泉一样,跨国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虚拟性的思考。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如果能够与企业以及政府机构合作,通过严谨的社会科学实验,来探索如何让企业与社会实践移升到更优的平衡点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如何基于因果机制将国外创新有趣的实践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来探讨新型的企业战略与组织架构可能会是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意义的研究。

接受编辑: Haiyang Li

收稿日期: 2020年5月14日

接受日期: 2020年5月14日

作者简介:

Yanbo Wang (王砚波) 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战略与政策系。他的研究方向为新兴市场环境下的创新与创业行为,尤其是制度设计、公共政策以及社会网络对企业战略选择、组织架构演化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他的文章发表于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Management Science*, *Research Policy* 和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等学术杂志。其目前项目主要研究专家对创新型项目的评审中的认知偏差,这些偏差的来源以及潜在的消除机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

Danyang Chen (陈丹阳), 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战略与政策系博士生。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家族企业、制度理论和创业管理。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曾被 2019 年 AOM 年度会议接

受并汇报。其关于制度理论和财务舞弊的研究被 2020 年 SMS 会议接受并提名博士生论文奖。

参考文献

- [1] 张腾、张玉利、田莉：《经典环境模型及其演化分析》，《管理学报》，2015 年第 8 期。
- [2] Barkema, H. G., Chen, X. P., George, G., Luo, Y., & Tsui, A. S., 2015. West meets East: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 460–479.
- [3] Bian, Y. 2017. The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of guanx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3: 261–267.
- [4] Burt, R. S., & Burzynska, K. 2017. Chinese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guanx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3: 221–260.
- [5] Chen, G. L., Chittoor, R., & Vissa, B. 2015. Modernizing without westerniz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action in the Indi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 511–537.
- [6] Chung, C. N., & Luo, X. 2008. Institutional logics or agency costs: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s on business group restructuring in emerging econom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9: 766–784.
- [7] Greenberg, J. 2019.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start-up typ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Collaboration*, 135.
- [8] Huang, Y. 2003.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Jia, N., Shi, J., & Wang, Y. 2013. Coinsurance within business groups: Evidence from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 an emerging market. *Management Science*, 59: 2295–2313.
- [10] Khanna, T., & Palepu, K. 2000. Is group affiliation profitable in emerging markets? An analysis of diversified Indian business groups. *Journal of Finance*, 55: 867–891.
- [11] Kim, L. 1997.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dynamics of Korea'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 [12] Li, H., & Atuahene-Gima, K. 2001. Product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 1123–1134.
- [13] Luo, X., & Chung, C. N. 2005. Keeping it all in the family: The role of 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hips in business group performance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 404–439.
- [14] Malesky, E., & Tassin, M. 2017. The danger of not listening to firms: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the goal of regulatory compli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0: 1741–1770.
- [15] Montinola, G., Qian, Y., & Weingast, B. 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50–81.
- [16] Siegel, J., Pyun, L., & Cheon, B. Y. 2019. Multinational firms,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apture of outsider's advantage by exploiting the social divid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 370–397.
- [17] Sorenson, O. 2017.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apital i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3: 275–280.
- [18] Suarez, F. F., & Utterback, J. M. 1995. Dominant designs and the survival of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6: 415–430.
- [19] Utterback, J. 1994. *Mastering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 Wang, D., & Luo, X. R. 2019. Retire in peace: Officials'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 773–809.

[21] Yue, L. Q., Wang, J., & Yang, B. 2019. Contesting commercialization: Political influence,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 435–465.